

论曾国藩的勤俭持家之道

孙 翔, 雒 季^①

(兰州城市学院, 兰州 730070)

摘 要: 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也是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的精粹。曾国藩持家之道的内容包括勤俭持家、尚勤戒惰、崇俭戒奢等三个方面。这些思想对于抑制现代家庭的不良消费习惯, 促进现代家庭伦理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曾国藩; 勤俭; 持家

中国历代的贤德之士对勤俭美德的赞扬不胜枚举, 如古代有“克勤于邦, 克俭于家”、“一生之计在于勤”之说; 近代也有人发出“百种弊端, 皆由懒”的议论, 就连平民百姓都相信“耐得苦, 必得福”的道理, “惜衣常暖, 惜食常饱”、“家有粮米万石, 也怕泼米撒面”等这些散发着泥土芳香的谚语,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节俭在中华民族精神中所具有的巨大作用。中国人向来勤劳有素, 节俭成习。没有勤劳就不会创造出灿烂的华夏文明; 没有节俭, 即使“家有万贯”, 也会坐吃山空。深受传统思想熏陶的曾国藩对勤俭之美德自有其独到的感受和体悟, 他认为乱世中, 即使大富大贵也靠不住, 惟有“勤俭”二字可以持久, 勤俭是持家之道。

一 曾国藩勤俭持家伦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 勤俭持家, 情奢亡族

在中国传统伦理中, 勤俭被视为美德, 情奢被看作恶行, 但在封建社会, 它又恰恰是权贵家族的通病。曾国藩在功成名就、位高权重后, 没有因此而放松对自己及家人在勤俭这一美德上的要求。他从大量历史知识以及曾氏家族勤俭持家的祖传家风中汲取经验教训, 认为勤俭是关乎个人、家庭和社会兴衰成败的关键。“历览有国有家之兴, 皆由克勤克俭所致, 其衰也, 则反是。”^{[1] 31}基于此, 曾国藩得出勤以习劳, 劳以免佚, 是生动兴旺之气象, 俭以养廉, 是收敛得气象的结论。一家之勤俭与否, 决定其家运的兴隆更迭。大富大贵, 无济于事, 只有勤俭, 方可长保盛美; 而情奢则必亡族。因此他在他在外别无他虑, 总担心子侄习于骄奢逸。在他看来, 家多因奢字而败, 人多因逸字而败, 而讨人嫌多离不得骄字。^[2]他总结的居家四败中的首败就是“奢败”, 在给两儿的信中告诫他们: “尔等奉母在寓, 总以勤俭二字自惕……凡世家之勤不俭者, 验之于内眷而毕露。余在家深以妇女之奢逸为

虑。”^{[3] 1194}

曾国藩不仅在家庭日常用度上强调勤俭, 即使儿女的婚姻大事也从勤俭入手, 他给父母去信说: “儿女联姻, 但求勤俭孝友之家, 不愿与宦家结契联姻, 不使子弟长奢惰之习。”^{[4] 84}这里对门户之见的突破, 在当时是何等难能可贵, 并反映出他对于治家的深刻见解。对于初来的新妇, 他也不忘嘱咐儿子教以勤俭, 并认为纺绩以事缝纫, 下榻以议酒食, 此二者是妇职之最要者。他在家信中时时告诫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 “尔一切以勤俭二字为主”。同时, 曾国藩对自身也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他说: “余欲上不愧先人, 下不愧沅弟, 惟以力教家中勤俭为主。余于俭字做到六七分, 勤字则尚无五分工夫; 弟与沅弟于勤字做到六七分, 俭字则尚欠工夫……弟每用一钱, 均须三思, 至嘱。”^{[3] 1159}字里行间无不体现出其勤俭持家, 情奢亡族的思想。

(二) 尚勤戒惰, 勿忘“勤敬”

对勤俭二字, 曾国藩尤其看重勤字。他认为: 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农人有勤则五谷丰登; 官人有勤则政通人和; 商贾有勤则市肆繁荣。同样一个家庭, 勤则旺, 惰则败。勤劳不仅仅是创造财富的手段, 还是做人的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他在给子女的家信中常询问“已沾染贵公子习气否?”、“近日家中内外大小, 勤俭二字做得几分?”无不表现出一位长者对后辈的无限关爱之情。

曾国藩以史为鉴, 指出: “历观古来世家久长者, 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 妇女须讲求纺绩酒食二事……妇女纵不能精于烹调, 必须常至厨房, 必须讲求作酒作醢小菜换茶之类。尔等亦须留心于蒔蔬养鱼。”^{[3] 1268}为了教育后辈勤劳习苦, 即使在门庭极盛之时, 他也提醒夫人“家中遇祭酒菜, 必须夫人率妇女亲自经手……内而纺绩做小菜, 外而蔬菜养鱼、款

① 收稿日期: 2008-06-23

作者简介: 孙 翔, 女, 甘肃庆阳人, 兰州城市学院城市经济与社会管理学院讲师, 伦理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 雒 季, 男, 甘肃秦安人, 兰州城市学院城市经济与社会管理学院副教授, 法学硕士, 研究方向为法学理论。

待人客,夫人均须留心。”^{[3]130}同时,他对诸弟不好收拾洁净的现象,在家信中告诫诸弟:“嗣后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伶俐,以为儿侄之榜样。一代疏懒,二代淫佚,则必有昼睡夜坐、吸食鸦片之渐矣。”^{[4]276}在他看来,子侄除读书以外,可教他们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这是极好的事。他曾称赞子女所做的盐姜、椿蒜子腌菜不错。对于妇女,他认为:“新妇初来,宜教之入厨作羹,勤于纺绩,不宜因其为富贵子女不事操作。”^{[4]327}他希望子侄保持半耕半读的家风,不要有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关于拾柴收粪等事,要一一为之;插田萍禾等事,也时时学之。这样就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荡了。

自小在农村长大的曾国藩视勤为人生第一要义,而勤又以“不晏起”为第一要义,“勤之诀,第一贵早起,第二贵有恒”。其“八本”中就有“治家以不晏起为本”之说。他对儿子语重心长地说:“我朝列圣相承,总是寅正即起,至今二百年不改。我家高曾祖考相传早起……尔既冠授室,当以早起为第一先务。”^{[4]506}受其影响,家中子弟皆以“早起”为日课的第一项。勤惰相对,尚勤则必然戒惰。曾国藩认为,天下古今之庸人,都是惰字所致;军事的失败,宦室的败落,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惰是败家之道,因此他要求子弟必须戒惰。而戒惰以不晏起为首,要多走路,少坐轿,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兄弟互勉,子弟效法,力保曾氏家族的鼎盛不衰。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十分重视“勤敬”,“凡一家之中,勤敬二字能守得几分,未有不兴;若全无一分,未有不败。”^{[4]275}因此,他告诫:“诸弟在家教子侄,总须有勤敬二字。无论治世乱世,凡一家之中能勤能敬,未有不兴;不勤不敬,未有不败者。至切至切。”^{[4]264}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至要至要。”^{[4]267}在这些言语之间足以看出“勤敬”在曾国藩“治家之道”中的重要地位。

(三)崇俭戒奢,淡泊官财

曾国藩认为兴国兴家,不仅需勤,还需俭。勤为竭力劳作,广开物源;俭为谨身节用,量入为出;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空。要做到节俭,就要反对奢侈,他屡屡告诫儿子,世家子弟,钱衣不能多,不要多用仆婢雇工。并常问居家之弟“俭字工夫,日来稍有长进否?”并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3]837}并且他能以身垂范,个人生活非常俭朴并行之终身,早起早睡,布衣粗食,吃饭每餐仅用一荤,“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4]324}

在曾国藩看来,仕宦之家最易滑入奢侈之坑,因为他们有条件 and 可能变得奢侈。因此他告诫儿子,居家以崇俭方可长久,而且居家比居官重要,“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省俭之意。”^{[3]1338}虽然凡人多希望子孙为大官,但他不愿为大官,而愿做读书明理之君子。在“学而

优则仕”的封建时代,能有这样的超人识,实数少见。

为人父母者离世之时多想方设法为子孙敛财祈福,而曾国藩认为,一个家庭兴旺与否,全靠出贤子弟。子弟若贤,则不靠宦囊,也能自觅衣饭;如果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钱积产,都是枉然。他认为银钱、田产最易长骄逸之气,因此他要留给子孙精神财富而不是钱财和官位,要求他们崇俭戒奢,淡泊官财。并且自己不欲多寄银物至家,总担心老辈失之奢,后辈失之骄,希望子弟在俭字上下工夫。不仅如此,曾国藩对家中的奢华之举,也时时教责,表达自己的不满。当他得知弟弟改屋破费大时立刻去信责问,为何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并说自己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没想到自家竟行之。他告诉诸弟“切莫玉成黄金堂买田起屋”,不要蓄积银钱,这样子弟自觉一无可恃,则会渐渐勤劳,知谋求自立之方了。

曾国藩崇俭戒奢,淡泊官财,但其俭而不吝,他对料理家事的四弟说:“弟为余照料家事,总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4]546}在给儿子纪鸿的信中也有“其照例应用之钱,不宜过啬”等字句。他是想告诉家人,居家要节俭,但节俭不可流于刻薄,不要因俭而损害了与人们交往的情意。曾国藩就是这样以身垂范,谆谆善诱,细心周到,教导兄弟子侄谨守俭朴之风的。

二 曾国藩勤俭持家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勤俭作为一种美德,不仅能够保证物质需要的经常满足,更具有内在的精神价值,它可以促进人的本质力量充实、提高与完善,是德与富的源泉。勤俭所增进的物质财富是暂时的,而它内涵的精神财富则是永恒的。所以各个历史时代的广大劳动人民乃至封建统治阶级的有识之士,无不以勤俭为持家的要诀、治国的法宝。勤俭的优良传统美德,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在当今社会,人们对待勤俭的态度却并非如此。在一些人的眼里,“劳动”已不再是一个神圣的字眼,他们一心向往的是坐享其成,甚至不劳而获,梦寐以求有朝一日能当“大款”,做“富婆”;一些人不是靠自己的诚实劳动创造财富,而是为了富裕不择手段:坑蒙拐骗,贪污受贿,抢劫偷盗,乃至杀人越货。在节俭方面,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人在享乐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不顾国情国力,居则华屋广厦,食则美酒佳肴,行则宝马香车,导致了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消耗。更有甚者,大款们争富斗阔,一顿饭吃掉数万元的有之,餐桌上大摆“黄金宴”的有之,一件皮大衣花掉数十万元的有之。^[5]更令人担忧的是当今孩子们的消费状况,许多学生不顾家庭经济实力,摆阔气,赶潮流,追求高档化、奢侈化的生活倒成了众心所向。据国家统计局所属的兰德信息公司曾对北京、上海、成都等几个大城市所作的调查,全国0-12岁的孩子每月消费总额超过35亿元。进口服装用品、食品的消费,北京孩子居全国第一,每月花费5亿元,孩子的花费占家庭收入的一半。工薪阶层80%的家庭中,一个孩子的月平均消费超过一个大人。^[6]如此种种不合理的消费现象,显然有悖于勤劳节俭的传统美德,而反观曾国藩对勤俭的重视及

对子弟勤俭习惯养成的教育,对现今社会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勤为富足之源、德之本。曾国藩认为一家能勤则兴旺发达,一人能勤则健康安乐,能勤能俭永不贫贱。他从身勤、眼勤、手勤、口勤、心勤五个方面作了详细分析,认为勤劳绝非仅仅局限于聚积物质财富,而是要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力戒怠惰,做到黎明即起,洒扫内外,晏眠早起,戒骄戒奢,“后辈诸儿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4][45]}在他看来,勤劳既是对心态的锻炼,也是道德修养的完善过程。曾国藩赞颂勤劳,视懒惰为丧身败家的恶德,这种勤苦劳作思想在今天仍不失其积极意义。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大人多,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科学技术和教育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尽管有了一定的建设成就,但综合国力并不强大,人均财富仍很贫乏。在这种形势下,要实现民族的复兴,就有赖于全国人民诚实劳动,勤劳奋发,艰苦奋斗。

其次,俭以养德,俭而不吝。俭关系着家庭、社会的稳定与富足,而且也有利于人的道德品质的完善。正是在此意义上,曾国藩一面告诫子弟要尚俭戒奢;一面又强调俭并非吝啬刻薄,要淡泊官财,周济邻里。所以说节俭不仅是为了平安度日,其实质是对自然界物质资源的爱惜,对人类艰苦劳动成果的尊重,而非把物质财富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所诱发的享乐及腐化堕落思想,不断刺激人们的消费欲望。今天我们不能要求人人一味节衣缩食,但也绝不能鼓励放纵物欲。珍惜财物,节约用度的俭德仍应当大力提倡,不顾我们的实际国情、民情,大肆超前消费,讲排场,摆阔气,必然会不利于社会的生产与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人们只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图进取,那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毫无希望,没有不走向衰落的。因此,我们应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倡导曾国藩勤俭持家思想中所包含的许多积极因素,古为今用,使我们的社会健康有序地向前发展。

最后,提倡勤俭,也是自然生态文明发展的迫切要求。近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工业化的生产、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了经济迅速增长的喜悦,使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不断征服。然而,由于人类的贪婪、奢侈与浪费,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正在发生着灾难性的变化。资源

枯竭、大气污染、水土流失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为了人类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世人必须要勤俭。勤劳是人类财富之母,因勤劳而知劳动果实来之不易,从而产生节俭。舍弃它,人类将不能自存,更谈不上发展。勤俭节约,勤俭持家,勤俭敬业,勤俭治国,这是历史对我们的启示,也是自然生态文明发展的迫切要求。从爱惜“小家”的一财一物开始,斟酌慎用,才能保证地球“大家园”自然资源的可持续运用,保证人类的长足发展。

总之,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不仅对曾氏家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也对近代史上的许多名人及平民家庭的治家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他的治家伦理思想在我国近代治家伦理思想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但应当指出,曾国藩的勤俭持家思想作为小农自然经济的居家生活原则产生于封建社会,它的一些具体行为规范,如粗茶淡饭、简居陋衣等等,具有明显的封闭性、保守性,与当今商品经济社会生活不相适应。但他所强调的积极劳作,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财富,创造自己的生活,珍惜人类劳动的成果,在勤俭中锻炼和完善自己的本质等等,却仍然值得我们借鉴,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及其家教之成功经验,对于改善现代家庭中的人伦关系,克服家庭领域的诸多弊病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 [1] 曾国藩全集·家训(卷下)[M]. 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7.
- [2] 周俊武. 曾国藩家庭伦理思想探微[J]. 伦理学研究, 2005(5).
- [3]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M]. 长沙:岳麓书社, 1986.
- [4] 曾国藩.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M]. 长沙:岳麓书社, 1986.
- [5] 许亚非.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及其现代价值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191-193.
- [6] 王恒生. 家庭伦理道德[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1 269-270.

(责任编辑: 骆晓会)